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刘纲纪 雍 涛 李南熏 陈祖华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我们党走过了艰苦的历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辉胜利。中华民族结束了近百年来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中国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满怀信心地迈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步伐。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早已是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的了。

为什么我们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而不断地取得胜利呢？这自然有许多历史的原因。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不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且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又是渗透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之中的活的灵魂。近代以来，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寻找一种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哲学武器，但结果都未能成功。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才第一个锻造出了这种哲学——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升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领导了历次革命运动的先进人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所要解决的任务看来极为纷繁复杂，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情况，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就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正确的哲学作指导。所以，从鼓吹变法自强的康有为开始，对哲学的较为自觉的、系统的思考就提上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日程了。我们试看康有为以及谭嗣同的一些著作，他们所要解决的虽然是变法维新的非常具体的问题，但却常常是从宇宙、自然的大道理开始谈起的。这是因为他们要证明自己的政治见解是正确可行的，不得不求助于哲学，不得不对他们的见解给予一定程度的哲学论证。康、谭之后，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更加注意哲学，思想也比康、谭进步。他提出的“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是他的“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

但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但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从基本的形态上看，不外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另一个是庸俗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虽然

已经超出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论，开始同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了，但却是不彻底的，形而上学的，充满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往往出发点是唯物的，最后的结论却是唯心的，或陷入了二元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和转换，对精神作用的狂热的夸张，以及企图坚持唯物主义却又无法贯彻到底，这是近代从康有为以至孙中山的哲学的特征。由于找不到一种彻底的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始终不能清醒切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更不可能把握它的规律，而经常陷入空想，指望依靠某种精神力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对于敌、我、友的认识上也不断发生错误。除了机械唯物论之外，康有为等人还用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来论证中国社会必须变，不变是不行的。但他们都把变归结为量的不断积累。只有渐变而无突变，否定革命的飞跃，一再论证社会的进化“不能飞越”。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利益相调和”，而不是“利益有冲突”。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在长时期内抱有很大的幻想，常常希望用妥协调和的方法去取得革命的胜利，或以为在敌人遭到打击失败之后，就不必再进行斗争，妥协调和就能解决问题，保住革命的成果。

历史告诉我们，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它以之作为武器的哲学也同样是软弱的、不彻底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胜利，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人民斗争需要的、彻底科学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少数先进分子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由于这一哲学在俄国的应用所取得的伟大成功，更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连串的失败，证明了中国原有的或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哲学都无法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那情况就象一个久久在迷途中徘徊的人终于得到了一个能够确定方向的指南针。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已来到了中国，决不等于中国革命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也不等于它立刻就能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正确地运用和掌握。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论，它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第二种是以陈独秀以及后来的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他们虽然肯定（至少是在公开的言词上肯定）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但他们或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否认这个普遍真理还需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三种态度，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态度。正是这个结合，使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了一种科学的革命的哲学，一种唯一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哲学，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他个人所具有的特殊条件分不开，但更根本的是由于近代和现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造成了能够实现这种结合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后，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成了世界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它的发展前途只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只有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正因为这样，中

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彻底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本的条件，并且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克服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精神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所进行的革命，它具有与西欧和俄国的革命不同的很多特点，同时又对当代世界革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这一革命的进行，必然要在它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取得许许多多丰富的、新鲜的、深刻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又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哲学方面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的传统。中国素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哲学一向重视使自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际事务相结合。中华民族虽不以进行抽象思辩著称于世，但却善于把哲学的普遍原则同日常的实际事务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五四”运动以来，党内外都有一些同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介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是，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精神实质，运用它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却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从他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就不倦地阅读、研究他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有关的论著，并虚心地从这些著作中吸取一切他认为可取的东西。但是，他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同，毛泽东同志长期身在革命的漩涡中，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才智，而且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这就使得他具备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优越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主要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的探讨，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去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形成一种同中国革命需要相适应、便于为最广大群众掌握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即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它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各个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了。

（一）唯物论

如前所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为了解决变法或革命的问题，他们在哲学上主张唯物论，但他们的唯物论却又是不彻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人所提倡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即使在它的老家西欧，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到了中国之后，又沾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余毒。毛泽东的唯物论则不同，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是哲学史上唯一彻底的唯物论，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论。只有这种唯物论才能解决康有为等人始终纠缠不清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把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这无疑是近代以中国哲学史和革命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意义巨大的飞跃。

但是，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并不仅仅是由于他正确地介绍和复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更根本的是由于他把这种唯物论运用到中国革命之中，把它确立为中国革命的

指导思想，并打败了一切与之相反的唯心论的思想。

我们党成立之后，就党内的情况来说，公开地在理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鼓吹唯心论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世界的本原是不是物质的这一类问题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争论。问题在于，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即使他们在口头上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但在实际上，在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的观察和处理上，却是违背唯物论的。究竟在对中国革命的观察和处理上，怎样才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呢？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把唯物论同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非常具体而又深刻地联结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就不再是书本上的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的一般原理，而成为同革命的具体实践血肉相连的东西了。判定一个革命者是否真正坚持了唯物论，不只看他在口头上是否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原理，而是看他在实际工作中是否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行动的指针。“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理论上说，它是对哲学基本问题唯物论的辩证的解决，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唯物论；从实践上说，它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只有遵循这条路线，我们才能如实地了解中国的国情，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候违反了原则，革命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和唯物论相关，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近代中国哲学史上，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一例外地都十分强调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这是同中国革命力量的弱小、革命敌人的强大这一情况分不开的。然而每当他们一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立刻就离开了唯物论的基础和前提，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只有毛泽东哲学思想才第一次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科学地解决了坚持唯物论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彻底的唯物论，同时又高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两者是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这种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论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对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大国中进行的，面临着极其强大的敌人和种种巨大的困难，如果忽视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那就无法争取革命的胜利，就会得出推迟以至取消中国革命的悲观主义的结论，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相反，如果脱离“实事求是”去讲主观能动性，又会象“左”倾机会主义那样陷入空想盲动的深渊。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之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取得的。

（二）认识论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找到一种能够指导革命行动的符合于实际的革命理论，这是孙中山以至章太炎等人已经意识到了的问题。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学说，其实质就是企图从认识论上来解决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革命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孙中山始终未能把知（理论）与行（实践）统一起来，相反，在最后的结论上，他把知与行分裂开来了。另外，他反对知而后行，提倡“不知而行”，这虽然是为了鼓舞人们大胆地去行，但无疑又带有盲目行动的色彩，看不到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毛泽东哲学思想才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的基础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知和行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时向一切革命者指出了如何认识革命规律的具体途径，阐明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

飞跃和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的飞跃)的原理,既反对了“经验论”的错误,又反对了“唯理论”的错误。这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问题争论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经常陷入“经验论”的错误,有时又陷入“唯理论”的错误。在我们党内,这两种倾向也经常发生,其表现形式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哲学的认识论为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 辩证法

近代中国进步的哲学对于中国社会能不能变,应不应当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心。然而,它肯定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却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这种理论,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并否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在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是坚持着这种庸俗进化论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虽然承认矛盾斗争,但他们总是片面地强调矛盾的斗争,忽视矛盾的同一,强调质变,否认量变,忽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他们不承认中国社会的矛盾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不认识一切具体的矛盾都是各各特殊的,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有毛泽东哲学思想才第一次把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系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彻底清算了上述种种错误的看法,正确地处理了斗争和同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辩证法理论,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在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方面,其成就是非常卓越的。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虽然讲的是军事,但同时又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其意义决不仅仅局限于如何指导战争,因为从革命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就象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一样,对于一切领域都有普遍的意义。

(四) 历史观

历史观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又是阶级斗争问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如康有为武断地宣称:“中国绝无阶级”。孙中山则认为中国只存在贫富的差别,不存在阶级的区分,并且认为社会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抽象的“善人”与“恶人”之间的斗争。这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否定,又使他们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力量在那里,究竟谁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经常分不清敌我。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竭力要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同样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力量何在,经常视敌为友。“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是主张进行阶级斗争的,但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不愿意去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复杂情况,致使他们同样分不清敌友,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不但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反而使中国革命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只有毛泽东同志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彻底驳斥了一切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谬说,同时又把这一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最雄厚的力量所在,反复地论证和强调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并把这一观点具体化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同志后来还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起来看，自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虽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但只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才第一次从根本上正确而完整地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各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一种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科学的哲学理论。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认清了中国的国情，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上述基本原理，不仅对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国初期，我们党在完成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巩固革命政权，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后来在克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是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的。粉碎“四人帮”后近五年的历史也同样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比如，对于我国国情的再认识，对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对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以及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等问题，都只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正确的解决。

当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某些个人的原因，毛泽东的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和局限，毛泽东同志晚期在哲学上也发生了一些失误。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和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指导作用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思想体系，因此只要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不必单提毛泽东哲学思想了。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的作风和气派，是唯一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便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哲学。在中国，离开毛泽东哲学思想，去空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为我们党能够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感到光荣和骄傲。为了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正确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推进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沿着他为我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